

Postgraduate / Distance Learning Assignment coversheet & feedback form

THIS SHEET MUST BE THE FIRST PAGE OF THE ASSIGNMENT YOU ARE SUBMITTING
(DO NOT SEND AS A SEPARATE FILE)

For completion by the student:		
Student Name: Weichen Gao		
Module code: SICH7021 Module title: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Student ID number: 1706351	Educational support needs: No
Module tutor: Prof. Chen, Fengyuan Assignment due date: 16 th September 2022, 15:00		
If your module has multiple submissions please indicate which piece of work this is. 1 st ☒ 2 nd ☐ 3 rd ☐ 4 th ☐ 5 th ☐ 6 th ☐		
Word count: 6160 Chinese characters		
I confirm that this is my original work and that I have adhered to the University policy on plagiarism. Signed <u>..Weichen Gao...</u>		
Email submission: if you are submitting this form via email, please tick this box ☐ (as a substitute for your signature) to confirm that you agree to the above declaration.		

Assignment Mark	
1st Marker's Provisional mark	
2nd Marker's/Moderator's provisional mark	
Agreed Internal Mark:	
External Examiner's mark (if relevant)	
Final Mark	
NB.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1:

Comments:

Marker's signature:

Date: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2/Moderator:

Comments:

Marker's Signature:

Date:

AGREED INTERNAL MARK (where necessary):**Comment on process on arriving at agreed mark:****External Examiner's comments (if relevant)**

External Examiner's Signature:

Date:

孔子與六經

——皮錫瑞、周予同的經學史觀傳承與遞變

一、前言

清·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號師伏先生，湖南善化人。幼承庭訓，好學敏思。先後於湖南、江西多所書院任講席。光緒間，時局動蕩，皮氏倡屯田固邊、救藩備圉等建議。甲午後，變法潮起，而皮氏以爲：「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臧吏，實事求是。且必先改宋、明陋習，不必皆從西俗。」¹皮氏少時留意詩文，年三十乃始治經，然研精覃思，著作頗多，卒以經學名世。皮氏論爲學之方：「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蘊瞭然於心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明切究，方爲有體有用之學。」²可見皮氏治學主張，在於由通經而致用。其倡議政府、講學著述、留心局勢，皆本此意，正如周予同謂其：「有經世之志，留意郡國利病。」³皮氏爲今文學者，所著《經學歷史》，梳理經學源流，自孔子至清末，論述本於今文家立場。⁴

周予同（1898-1981），原名毓懋，學名豫桐、蘊，字予同，浙江瑞安人。早年研究教育學與教育史，後主攻中國經學史，成就斐然。⁵年三十，爲皮錫瑞《經學歷史》作註，並爲之作序。周氏肯定皮氏著作之價值，同時亦提出審視與批評。據筆者觀察，孔子與六經之關係，實爲二人跨時代論辯與歧見之核心。周氏曾言：「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必須解決『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⁶周氏《經學歷史·序》「皮著《經學歷史》略評」一節，開頭便囑讀者留意皮氏今文學家之立場，及其「孔子作六經」之觀點，不如此則不足以知皮氏學術得失。可見，孔子與六經之關係，實爲中國經學史之先決課題。

¹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2版7刷），〈附錄一：皮鹿門先生傳略〉，頁351。

²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附錄一：皮鹿門先生傳略〉，頁351。

³ 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版2刷，增訂版），〈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99。

⁴ 周予同謂：「他不能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別來記述經學，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幟之下來批評反對派。」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102。

⁵ 王利：〈淺論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研究〉，《經學研究論叢·第二十三輯》（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7年10月），頁1。

⁶ 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頁795。

本文試從皮氏、周氏意見分歧，釐清二人各自以何立場、視角看待孔子與六經之關係，考察其視野之得失，總結二人經學史觀之遞變於經學研究歷史脈絡中所具之作用及時代意義。而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究竟如何，今日學界仍眾說紛紜，未有定見，有待日後出土文獻之證明，非本篇所論者矣。

二、因功利而信古：皮錫瑞的今文家情懷

「經學史」之最初，可上溯至漢代，《史記》、《漢書》之〈儒林傳〉已具「經學史」之意識。然完整、系統經學史之撰寫，卻遲至清末民初。⁷皮錫瑞《經學歷史》在彼經學史缺乏之時代，具有創始、啟發意義。如周予同〈序〉中所言：「我現在介紹皮著《經學歷史》於讀者，並不以為這本書是萬分完善，毫無可議；在現在經學史這樣缺乏的時候，無論如何，這本書是有一讀的價值的。」⁸皮錫瑞對孔子與六經關係之見解，於《經學歷史·經學開闢時代》充分展現。總歸其大旨，蓋有如下諸端。

第一，皮氏以為「孔子以前，不得有經」⁹。孔子刪定之前，經之原始文本雖已存於世，然皆散亂失統，無甚價值，不得稱「經」。皮氏謂：

《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亦如《連山》、《歸藏》止為卜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為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為經矣。《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檮杌》止為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為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為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周禮》出山巖屋壁，漢人以為瀆亂不驗，又以為六國時人作，未必真出周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為三百篇，刪《書》為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¹⁰

由此，皮氏認定，所謂六經，皆由孔子修定而後，始得言「經」，始具有「經」之意義。而東漢之後，凡對經之著作持懷疑者，皆為「疑所不當疑」。

第二，孔子作六經，旨意閎偉，垂教萬世，以為準則，所謂「後之為人君者，必遵

⁷ 王利：〈淺論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研究〉，頁1。

⁸ 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101。

⁹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9。

¹⁰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9-20。

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後之爲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¹¹若六經不爲孔子作，則經之重大意義將不復存在，經學亦將壞亂——於《易經》，則「不過爲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於《詩》、《書》，則「不過如昭明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編輯一過，稍有去取」；於《春秋》，則「以爲本周公之凡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錄一過，稍有增損」。¹²面對以上對孔子作經之懷疑與不同意見，皮氏曰：

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爲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

13

以上兩則，爲皮氏論點之核心，該章其餘論述，或引述，或議論，或讚同，或駁辯，要皆不逃此二旨。

自皮氏之議論，吾人可獲得兩點觀察：

一，皮氏以孔子爲六經之作者，大多源自對於六經之功利態度及對孔子之信仰。所謂功利，並非貶義，由六經以求經濟、教育之用，乃今文學家之長處，誠嘉意也；而所謂對孔子之信仰，乃以爲孔子聖人必作經以垂後世，若經不由孔子作，則孔子不如此偉大，徑淪爲箋注家云云；若孔子不作六經，則六經非聖人所作，其重大意義將不復存在，經學將無以立足，終而導致「經學不明，孔教不尊」。¹⁴皮氏之出發點固然有著亦經學經世濟民之情懷，然而其以此爲唯一的視野展開經學史之撰述，似更有可商榷處。原因在於，皮氏以此功利與信仰作爲論據，任其固化爲先入爲主之觀點，從而導向六經皆孔子所作之結論，如此則其他方面之文獻證據、邏輯推論，似成爲一種附庸、裝飾。而這樣的議論，對於抱持同樣見解與信仰之今文學家，固然可以獲得共鳴，但對於不同見解的學者，尤其是重視文獻證據的古史辨派學者，在研究態度、切入角度上便已全然不同，使得二者無法站在同一平臺上取得平等、對應的討論。

二，作爲一部經學史，則當在歷史中的不同觀點之間，作敏銳的觀察，並如實且全面地陳述。然而，皮氏並未採取此一種角度，而選擇作爲一個今文學派之捍衛者，守護

¹¹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26。

¹²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27。

¹³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27。

¹⁴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27。

今文學之精神，批判異見，攘臂以告天下之人，相與攻擊他派而棄之。如其討論六經之淵源，論《易》則斷言「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儀禮》則以爲周公之遺云云，此等前提是否如實，在經學文獻之研究上便已充滿問題與不同之見解，而其對此竟未多加一言，而徑以之爲定論，作爲孔子作六經之前提，尤顯單薄。其對於孔子與六經之意見，則尤其如此，以今文學之角度攻擊他派，而不予之從始至終之梳理、闡述。這種態度，使得其《經學歷史》難免偏狹、偏袒之譏，而有失於廣博、周全矣。

三、求真相而疑古：周予同的古史派審視

1928年，周氏完成《經學歷史》注並序。此書於周氏，並非最理想之經學史資料，然以當時經學史之匱乏，此書仍有承啟之效，如周氏謂「爲經學史闢了一新途徑，是值得我們後學者尊敬的」。¹⁵於〈序〉中，周氏褒揚皮氏治經之長：

皮氏治經，宗今文，但持論平允，沒有康有爲那樣的武斷，也沒有廖平那樣的荒誕。……他的著作內容，雖沒有很偉大的創見，如同時幾位著名的經今文學大師；但學術門徑很清楚，善於整理舊說；所以如《經學歷史》、《五經通論》等書，對於初學者，真可稱爲「循循善誘」。¹⁶

皮氏平允而不武斷、不荒誕，治學門路明瞭，善於整理舊說，皆爲周氏所肯定。

從另一角度言，周氏雖爲皮氏《經學歷史》作註，卻未曾偏袒皮氏，周氏肯定該作之時代意義，同時亦指出其認爲不足、乃至「荒謬」之處，要之有如下三點。第一，皮氏宥於今文學家之視野，未跳出局限，「不能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別來記述經學，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幟之下來批評反對派」¹⁷。第二，皮氏缺少史學角度。周氏謂：

因為他不是史學家，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備，史料的排比不妥善，而且每每不能客觀地記述事實，而好加以主觀的議論。他這部書，假使粗略的翻閱，似乎不能將經古今文學、宋學的發生、變遷、異同、利弊一一顯示給我們。

¹⁸

第三，周氏認爲皮氏「孔教救國」、「六經致用」、「緯侯足徵」之說荒謬不經。基於上述觀點，周氏於其著作《群經概論》中，謂皮氏就孔子與六經關係問題上，所持乃是「極

¹⁵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104。

¹⁶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99-100。

¹⁷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102。

¹⁸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102。

端的主張」。¹⁹以上三條中，第三條——即對於皮氏「孔教救國」、「六經致用」觀念之批評（「緯侯足徵」一條，非本文所直接關注者，故不論）——尤屬孔子與六經關係此一核心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觀察。周氏對於此二點之批駁，茲各擇要錄之如下：

孔子學說的真相究竟怎樣；後世儒家所描寫的孔子，後世君主所提倡的儒教，後世學者所解釋的儒學，究竟是否是真的孔子，都是絕大疑問。在這步工作還沒有完成以前，冒昧地將傳統的因襲的孔教來治國，這簡直是鬼話。²⁰

今文學者每喜更進一步，探求「六經致用」的史例，於是對於西漢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誣地在讚歎着做着。……現在就是研究經學，也只能採取歷史的方法，而決不能含有些微的漢儒「致用」觀念。²¹

對於此兩點，為求得對周氏更深入的理解，我們有必要從周氏所處之時代、其看待經學之立場、及其有關經學的其他論述進行考察。

從時代言，周予同生逢新舊文化交替之巨大變革，受顧頡剛、錢玄同等古史辨學者影響，對於經學亦從「史」的視角出發。換言之，即抽離經典於經學本身之意義，全然以無信仰、無情感的態度，對其重新審視，即周氏所謂「以治史的方法治經」、「用正確的史學來統一經學」、「六經皆史料」。²²

對於孔子，周氏於 1934 年所撰〈孔子〉表達其觀點甚明。該文慎採資料，以《論語》為本，摒棄來源存疑者，以求還原孔子本來面貌。結論處，周氏表白：

孔子是一位中國古代人格完滿發展的聖人；他是一位實際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專研道德問題的倫理學家。他對於中國文化給與以巨大的影響，而且這影響曾經波及到東亞的其他國家。²³

言語之中，透露對孔子人格、思想、影響之洞察與尊敬。然而，周氏亦囑人們警覺於「假的孔子」，即後世政府或學者因刻意附會、理解偏差等原因，賦予孔子以人為之色彩，使偏離原本樣貌。一種為政治之「假孔子」，周氏謂：

漢武帝繼承漢高祖武力統一中國以後，採用董仲舒的建議，排斥春秋、戰國時代其他各派的思想，而單獨推尊孔子，並且以《五經》為研究孔子的唯一

¹⁹ 周予同：《群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1 月，2 版），頁 20。

²⁰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 102。

²¹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頁 103。

²²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治經與治史〉，頁 622。

²³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孔子〉，頁 388。

法門。……漢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決不是真的孔子。²⁴

二者為學術之「假孔子」：

孔子漸漸的變為董仲舒、何休，漸漸的變為馬融、鄭玄，漸漸的變為韓愈、歐陽修，漸漸的變為程頤、朱熹，漸漸的變為陸九淵、王守仁，漸漸的變為顧炎武、戴震。這就是因為「道統」、「學統」等等無聊觀念的關係，使歷代學者誤認個人的主觀的孔子為客觀的孔子。²⁵

因此，周氏提出：「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²⁶可見，周氏重視、尊敬孔子，其所警惕甚至反對者，乃後世過度詮釋、予以附會之孔子。其中，周氏視《五經》為漢朝求「政治的便利」而塑造、吹捧的文本。於此，則不得不談周氏對於儒家六經之看法。

對於儒家之六經，周氏的觀點因其年歲而有改變。周氏早年徹底否定孔子與六經之關係，以為孔子不曾作之，以為六經之存在僅作為政府統治人民的手段，「將大多數的國民變成『阿斗』，預先替帝國主義者製造順民」²⁷，一旦國家脫離所謂「封建統治」，六經便毫無價值。周氏於 1926 年撰〈殭尸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一文，以為學習六經如殭尸作祟，徑言：「五經是五部不相干的雜湊的書，與孔子絲毫沒有關係；孔子與五經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²⁸又曰：

經是可以讓國內最少數的學者去研究，好像醫學者檢查糞便，化學者化驗尿素一樣；但是絕對不可以讓國內大多數的民眾，更其是青年的學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對於莫名其妙的《聖經》一樣。如果要懂得修齊治平之道，這是對的；但是，下之有公民學，中之有政治學、倫理學，上之有哲學，用不著讀經！

1935 年周氏著〈對於「讀經」問題的意見〉，進而從社會需求角度駁斥六經的價值：

滿清政府一面想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以抵抗列強；一面想維持中國的君臣綱常，以穩定皇室；於是有「中體西用論」的產生，於是「讀經」在「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裏高據着首席。這是有社會背景可說的，因為我們的

²⁴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孔子〉，頁 338。

²⁵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孔子〉，頁 338-339。

²⁶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孔子〉，頁 338-339。

²⁷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對於「讀經」問題的意見〉，頁 618。

²⁸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殭尸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頁 601。

主人是愛新覺羅氏。現在，總算倖免，我們還不是「偽滿洲國」的臣民，我不知何以有「讀經」的必要？²⁹

又說：

中國現代的學校制度和古代的含義並不相同。古代的學校制度只有一種政治目的，就是養成統治人才；換言之，牠是官僚訓練所或官僚選拔處。現代的學校，除政治目的外，還含有更重要的經濟目的：詳言之，在基礎教育段要養成公民和勞動者，在專科教育段要養成國家公僕和生產技術人才。讀經和生產教育無關；而養成公民和公僕，也另有其陶冶的方法，決不必求助於「讀經」。³⁰

可見周氏立場鮮明，其視六經無非「封建統治」之手段，亦只作用於所謂「封建社會」，對於新社會體制，對於公民、勞動者、公務員、技術人才之培養，絕不相關，毫無價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晚年周予同的說法，似乎推翻了早年觀點。1959 至 1961 年間，周予同於復旦大學講授「中國經學史」，此時他承認孔子與六經是有關係的，此一變化，見於據其講稿與學生筆記整理而成的〈「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³¹以錢玄同否認孔子與「六經」之關係、以爲孔子無刪述「六經」之事爲例，周氏〈殭尸的出祟〉（1926 年）一文尙表示讚同，讚許錢氏：「他所搜集的材料與考據的方法是和漢學家一樣的豐富與縝密的。」³²然而在〈「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中，他對錢氏表達了異議：

總的來看，他的懷疑的立足點，卻很成問題。就是說，錢氏對這個問題先存否定的意見，然後在古代文獻中去尋找論證來替自己的觀點張目，這就不免陷於主觀主義。……在孔子以前，必有很多古代文獻遺存下來，它們的一部分，就殘存在「經書」之中。……孔子為了設教的需要，對各種故國文獻，加以搜集和整理，以充當教本。這些教本，傳下來成為儒家學派的「經典」。

³³

可見，此時周予同已與早年全然不同，由徹底否定六經與孔子之關係，轉向了承認。此一點，對於吾人了解周予同的經學史觀，十分重要。此轉變背後的原因，筆者尙未尋得資料以證明，但可以猜測，或因周氏隨研究深入、出土文獻之發掘，對於六經了解更進。

²⁹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對於「讀經」問題的意見〉，頁 617。

³⁰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對於「讀經」問題的意見〉，頁 619-620。

³¹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頁 795-805。

³²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殭尸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頁 602。

³³ 朱維鈺：《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六經」與孔子的關係問題〉，頁 798-800。

此時，再回到周氏對於皮氏「孔教救國」、「六經致用」觀念之批評，我們可以了解：一，周氏批評「孔教救國」，並非批駁孔子本身，而是提醒我們，不當盲目因循自漢而下對於孔子的描寫、附會，徑以之為孔子本意。我們要通過梳理的工作，還原孔子的本來面目，再談取舍。二，對於六經，周氏經過由否定到承認的轉變歷程。早年，周氏以為六經決與孔子無關，並以之為「封建制度」的手段，於新時代全無意義。此一理解，既消極，也激進。晚年，周氏認為孔子於六經很可能存在收集、整理之功。

至此回看皮錫瑞至周予同對於孔子與六經關係之探討，吾人可見經學史觀之繼承、進步。皮氏開近代經學史先例，卻囿於今文學家立場，未能客觀、全面闡述經學源流；對於孔子與六經關係，亦賦以基於信仰的主觀理解。若不跳出此有限，則吾人對於孔子的認知，確將如周氏所說，難免夾雜後世學者之附會、歧解，失去孔子形象之本真，如此斷非科學之態度。周氏以新史學派視角，整理經學，矯正皮氏一代傳統經學家之弊，對於孔子與六經，思考更進一步，試圖釐清真、假孔子，還原六經真相，不為「假者」所蒙蔽。此一態度，為當今經學研究所不可少者，然而周氏同時亦未免受古史派偏激風氣影響，要之有兩點體現：一，斷言孔子與六經無關，然於其晚年，已自推倒之；二，斷言經學於當世無益，甚至「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³⁴，失於武斷，缺少對於經典的尊重與體認的溫度，忽視了儒家經典安身立命、修齊治平的哲學意義。可見周氏雖然時時以客觀自勉，卻仍未免於時代潮流。王利評價：

周予同的學術成長年代恰好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這對他一生的學術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以錢玄同、顧頡剛等人為代表的「新史學」派。在「經學史」的研究上，周予同雖然時時站在抽離的角度對其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周予同自己也屬於這個陣營。³⁵

此言誠是。另，周氏論六經無益，是將六經的意義建立在孔子之上——即，若六經為孔子作，則有意義；若非孔子作，則屬於「封建制度」之手段，必當唾棄。然而，經流傳之複雜，以及其與孔子之關係，斷非「是」或「非」的二元論所能答復。如周氏自己所言，此一辨析工作仍是當代經學研究者之課題。然而，在得出確論之前，國人之精神世界將何以顧全？經典的價值亦豈當因存疑而捨棄？吾人或可跳出周氏之有限，縱使六經非孔子所作，吾人豈不可從中去蕪存菁，發掘其可為今用者而學習之？何必待字字皆為

³⁴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6。

³⁵ 王利：〈淺論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研究〉，頁26-27。

孔子著而後始有價值也？更何況其並非與孔子無關乎？

四、結論

綜上所述，自皮錫瑞與周予同對於孔子與六經關係之討論，吾人可得一下觀察：

皮錫瑞以今文學家視角撰《經學歷史》，其視野不夠客觀，史料不夠充足。對於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絕對地以為六經皆為孔子所作，不符實情。然其重視孔子思想、六經義理，努力從經學中發掘啟迪以期應用於社會，足以給今人以正向思考與啟發。

周予同受五四運動思潮及古史辨派之影響，以史學視角整理經學。其態度謹慎，如對於「真、假孔子」之辨析，對於盲目崇信的挑戰，對於史料運用之審視，皆為科學研究所必不可少者。然周氏亦未免走向另一極端，忽略經學本身之哲學價值、社會價值。

馮友蘭謂：「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³⁶其所謂信古，即對於史料的一概相信，「不加以審查而即直信其票面價值」。³⁷所謂疑古，即審查史料；所謂釋古，即將史料融會貫通。³⁸皮錫瑞至周予同之流變，似乎恰印證前兩階段：信古、疑古。皮氏路徑是信古，周氏則屬疑古。二人經由《經學歷史》之媒介，完成跨時空對話，見證經學研究由信古到疑古的發展進程，頗具時代界碑意義。周予同曾說：「我們是超經學派，先要跳進去，還要跳得出來。」³⁹似乎也印證其將信古轉向疑古的學問路徑。然而，經學研究不可遂止於疑古，而必達於釋古——從疑古基礎上，整理證據，釐清疑問，重新發現經學本身的當代意義與價值，如是方為圓滿。如此則今日經學研究之工作，套用周氏之話，或許在於重新「跳進去」。這一「跳進去」並非走回老路，而是通過真相的還原，重新發現經典的意義。唐代禪宗大師青原惟信禪師曰：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然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⁴⁰

以之況今日經學研究之使命，或有異曲同工之妙歟？

³⁶ 羅根澤：《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冊，〈馮序〉，頁1。

³⁷ 羅根澤：《古史辨》，〈馮序〉，頁1。

³⁸ 羅根澤：《古史辨》，〈馮序〉，頁1。

³⁹ 王利：〈淺論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研究〉，頁11。

⁴⁰ 《大正新脩大藏經》（台北：宏願出版社，1992年），第51冊，〈續傳燈錄〉，卷二十二，頁614。

參考文獻

1. 《大正新脩大藏經》，台北：宏願出版社，1992 年。
2.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2 版 7 刷。
3. 王利：〈淺論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研究〉，《經學研究論叢·第二十三輯》，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7 年 10 月，頁 1-28。
4. 朱維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2 版 2 刷，增訂版。
5. 周予同：《群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1 月，2 版。
6. 羅根澤：《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